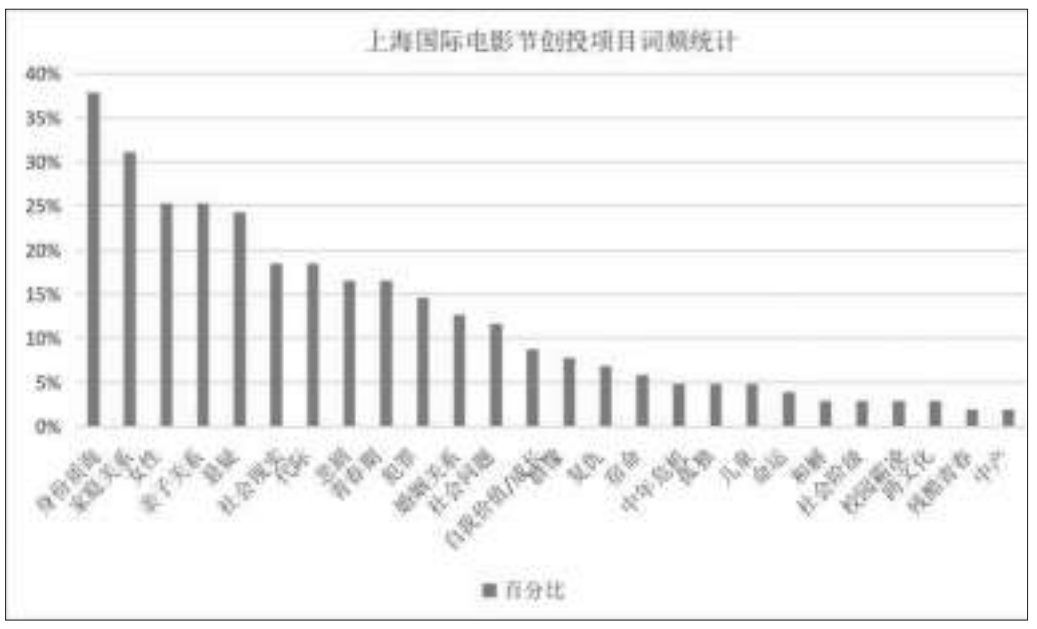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报 CHINA FILM NEWS 2022.04.20
责编:姬政鹏 责校:张惠 美编:李骁 E-mail:zgdyb2004@126.com



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的主题、要素与类型趋势特征

■文/陶涛 仝斯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电影票房总量“弯道超车”北美地区。2021年，中国以472.58亿元的票房成绩再度超越北美市场位居全球第一。然而，疫情的反复对电影工业造成重创，中国电影产业产能规模能否持续扩张成为其蝉联全球电影票房榜首位置的成败关键。2020年，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项目数量降幅创历史新高，2021年的项目数也仅为2800个，基本与2020年持平，受2022年新一轮疫情的严重影响，全国多地影院再次大面积停业关闭，猫眼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3月中旬，在60个城市共有1944家影院停业，数量占全国总影院的16.4%，票房占比高达15.9%，中国电影产业正面临供给不足、需求收缩等多重压力，如何开发“爆款”电影项目吸引更多的观众在“后疫情时代”走回影院，正成为全行业苦苦求索之发展核心，旨在孵化优质项目并发掘新锐电影人才的电影节创投单元正日益显现出愈加重要的地位。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自2007年设立创投单元以来，便以“沟通产业资源，扶持华语新锐影人，促进中外合作”为目标。截止至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已帮助82部影片进入制作，其中62部参与国内外各大电影节展，40部在国际A类电影节中崭露头角，更有数部斩获包括柏林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内的世界大奖。近两年来，尽管受疫情影响，上影节每年仍有超过300个影视项目积极参与创投评选。2022年3月25日，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项目征集工作刚刚进入项目评审阶段。相较于2021年的324个，今年的参赛项目数量和作品质量有望进一步提升，各类扶持资金与产业资源也将纷纷亮相。作为扶持青年影人的重要手段，上影节创投单元持续关注个体身份与价值表述、积极介入社会问题探讨的电影主题，探索东方美学语境下的叙事节奏与叙事模式，并试图构建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新电影类型，打造提升影视资源整合效率的全球性优质平台，其创投选题项目呈现出以下趋势性特征。

一、主题词高频重合概念：身份、女性与家庭

自创立以来，上影节创投单元一直致力于发掘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优质影视项目，鼓励青年影人表达在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热点、困惑与反思。近三年共计103个创投入围项目的主题及主要戏剧冲突点的词频统计分析显示（统计年份为2018、2019及2021年，2020年因疫情原因不做统计），当下青年创作者的优质作品在主题选择上呈现出高频重合性。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分别为：身份质询（38%）、家庭关系（31%）、女性（31%）、亲子关系（25%）、代际变迁（18%）（具体情况如图）。

这些词频常常以相互组合的形式出现，表现出对当下中国复杂现实中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以出现频率最高的主题词“身份质询”为例，鉴于其身份客体通常为女性和青少年，因此表现为“女性身份质询”及“亲子关系中的身份质询”两类组合方式。其中，以“女性身份质询”为主题的影片主要探讨的是社会性别视域下，当代女性该如何打破社会集体无意识所造成的对女性的忽略与歧视，以挣脱固有社会权力体系的束缚。以2021年入围的创投项目《她在水中央》的主人公胡璐为例，她一直处于社会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既定期待中不断挣扎，作为母亲，她极力为儿子提供优渥的生活环境与教育条件；作为妻子，她不仅要供养丈夫读书，更将丈夫的成功视为人生之终极目标……在得知丈夫略显颓丧甘于平庸的心愿之后，这位家庭的牺牲者与奉献者最终选择结束在海外朝不保夕的劳工生活回到国内，但她需要面对的难题，却是不知该如何恢复自己的母亲身份，重新建立与儿子的亲密关系。尽管未来依旧如在水中央般迷离，但胡璐无疑已开始探索自身价值与独立身份的出走之路。而2018年入围创投项目的影片《太后与我》，则展现了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后仍会面临的选择困境。《太后与我》的主人公陈落芽与母亲苏丽珍拥有看似不同、实则暗合的生活轨迹，在经历一系列职场失败之后，苏丽珍对社会文化规范下相夫教子的生活开始认命，而正处于职业选择期的女儿陈落芽，则在打破规范与接受束缚之间做出抉择，苏丽珍在探索自我身份与价值的失败经验成为了陈落芽自我意识觉醒的桎梏，这又将代际间冲突演绎为对女性的又一层心理束缚。

以“亲子关系中的身份质询”为主题的项目故事则多发生在破碎的原生家庭，围绕青春期叛逆、自我认同危机、追寻家族群体身份等内容展开，在历经一系列身份纠结之后，不论结果如何，青少年都将立足当下的人生与自己达成和解。如2018年上影节青年导演创投计划、2021年制作中项目《何处生长》，讲述了自幼无母的主人公程非，在与父亲产生家庭矛盾之后，假扮租客入住了生母何秀琴的家中，却意外发现何秀晴其实是因二孩政策被迫带着妹妹与自己分开的亲生母亲，程非试图在这种畸形分离状态的家庭中完成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尽管与现实生活中被迫分离的母亲更容易达成谅解，但因父母的欺骗所导致的家庭破碎无疑会对青少年造成更大的心理伤害。2018年的制作中项目《迷走广州》，则关注了一位早熟、压抑的女孩米淇跟精神状态极不稳定的妈妈相依为命，当米淇辗转找到早已在广州另组家庭的生父之后，却无法在已经破裂的家庭与自己作为被抛弃者的身份之间找寻到自我认同，最终走上了一条社会边缘人的逃离之路。这种家庭情感破碎的遗存关系致使主人公一直处于自我迷失的灵魂漂泊之中，无论如何找寻终将没有答案，唯留下难以治愈伴随终生的心理之疽及迫于无奈现实的与自我的无力和解。

二、核心叙事要素：陌生、边缘与复杂

上影节创投项目故事调性大多呈现出典型的低成本艺术电影特征，在叙事表达上克制内敛，间以意象性隐喻的东方美学方法构建核心戏剧张力。除了极小部分的商业类型片以外，入围项目大多包括三类核心叙事元素：陌生化戏剧情境、边缘人物或小人物、复杂的情感纠葛。陌生化戏剧情境通常都作为故事前提，在开端时便开宗明义地建构出主人公新鲜、复杂并难解的生存处境，人物被裹挟在不断发展的紧张事态之中，必须采取行动予以应对，然而，对抗的境遇却使人迷茫并陷入重重被动，故事也由此得以展开。2021年入围项目《晚春七日》，讲述了出国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工厂女工李咏梅，刚下飞机便得知女儿失踪，她不得不在异国他乡与黑人女警官携手开展调查的悬疑故事。该片巧妙地运用了纽约独特的空间建筑结构来制造视觉上的压力，构建起咏梅初到纽约后急迫、陌生与不安的无奈局面。观察近三年的入围项目，身处陌生化戏剧情境中的主人公，大多被设置为无力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社会边缘人群，他们作为事件核心人物的占比高达61%，涉及到多个年龄段与社会阶层。如2019年入围项目《幸福里99》刻画了居住在上海石库门里的两位空巢老人阿瓜与老克勒阿维；2021年入围项目《幸福泡泡车》中主角是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丽萍；2018年入围项目《不一样的礼物》则是聋人老师阿恩与自闭症儿童小浩的故事。这类边缘化人物因其弱势的生理条件与失语的社会身份共同决定其生存境况与心理问题，他们成为了某种承载群体性精神痛苦的当代社会现实镜像，从而引发广泛的社会性反思。对于在失控局面中苦苦挣扎的无力弱者，他们的情感通常都比较复杂纠葛，在因现实或心灵障碍下不得不进行艰难抉择的故事瞬间，他们往往都会面临多边情感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自身信念或社会性认知价值的崩塌。例如2021年入围项目《荒原舞会》，讲述两位爆炸案幸存者张若水与文迪分别选择遗忘与追凶以度过余生，当凶手再度出现在他们面前，是纠结于痛苦的回忆泥潭依旧逃避，还是鼓起勇气重新面对，终结内心痛苦的方式还需主人公去独自探索。2019年入围项目《沸腾》，则表现了一个渴望家庭的中年男性老方，突然发现自己才是杀害亲生女儿继父的凶手，在躲过女儿所策划的一系列报复之后，老方最终选择以精神自赎的终结方式，帮助女儿完成了对自己的复仇。在这个饱含有复杂情感浓烈爱恨的故事中，老方貌似求得自我内心平静的伟大行动，却也势必招致女儿陷入弑父的道德困境，作为旁观者，观众眼睁睁地看着角色滑向悲剧命运的深渊，也深刻体验到了人物无比抑郁的情绪却无处发泄的复杂情感。

三、艺术电影类型探索：人文、黑色与悬疑

近年来，出于对创投项目未来制作的可行性及市场接受度的考量，上影节创投单元表现出对艺术电影类型化探索的极大兴趣，对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黑色悬疑电影项目尤为偏爱。与传统悬疑片单一追求紧张氛围，塑造蛇蝎美人、幕后黑手与阴谋编织者等典型人物不同，上影节创投导演更注重将商业元素、黑色幽默与人文气质相融合，形成更具商业作者风格的个体价值表达，因此，这类项目也通常将社会问题作为推动悬疑事件发展的核心动力，使影片具备现实意义。如2019年制作中项目《枕边的陌生人》，主人公林青松在妻子意外身亡之后，却发现自称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爱人其实生长于偏远而贫穷的棚户区，父母品性卑劣，而她甚至可能还是谋杀双亲的嫌疑人，这个典型的黑色电影故事，将妻子日常温婉善良的伪装形象与真实黑暗的人性形成了巨大反差，而其复仇动机所揭示出社会边缘人群所承载的过大社会压力同样令人深思。2021年的创投影片《鹦鹉杀》触碰了当下网络情感诈骗的热门话题，将“杀猪盘”的犯罪类型与爱情类型糅杂进不断展开戏剧反转的黑色悬疑故事。2019年制作中项目《症候》，则建构了一个酸雨频发的魔幻现实世界，调查凶杀案的警官“科迪”生活在其中并饱受臆想症与身份混淆的精神困扰，当他最终发现自己居然不是“科迪”，而是杀害“科迪”的犯罪嫌疑犯时，他陷入了身份混乱并开始不断逃避现实。毫无疑问，这类带有意识流的艺术电影特质的新型悬疑类型片，以典型人物的命运触碰了严酷社会现实的道德底线，以独特的人文关怀关照了人类自身命运，激发了观众叩问人性并形成对社会的深度自省与反思。

身处“后疫情”的传播语境，中国电影仍需继续深化产业供给侧改革，营造友好开放的创作环境，上影节电影创投单元，在扶持新锐青年影人与孵化优秀电影项目中所表现出的趋势特征，正不断激发创作者开发更多满足人民不同艺术审美及商业需求的正能量作品，坚定地成为推动中国电影产业产能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陶涛，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博导；仝斯宇，中央戏剧学院2021级戏剧与影视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美学追求

——评影片《邓小平小道》

■文/周 舟

对于5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来说，后来被称为“邓小平小道”的那段江西泥泞路径是他人生里的又一页苦难；对于今天的人们，它成为中国现代化长征史诗里的别样风流。把这段“苦难”历史转化为“风流”叙事，是中国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也是难度极高的任务。

影片《邓小平小道》（王兴东编剧，雷献禾导演，江西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出品）担当起了这份责任，也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邓小平同志的精神感召固然是重要因素，创作者美学方面的自觉追求则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影片立意很高，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改作了“共产党人虽穷、却仍兼济天下”的叙事。影片里的邓小平，大多数时间里沉默、隐忍，在黄干事监管的视线和众人旁观打量的环境里用略显迟缓的速度运动着。他最大力度的爆发，是听闻当地孩子想吃粽子的哭泣后，坚持要黄干事把特供自己一家的粽子送去，他说：“我不特别，粽子也不特别，娃娃吃不上粽子才特别！我这个红军爷爷吃不下！”共产党人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在那一篮粽子和一碗白糖里。

在片中，邓小平所坚守的理想信念与他实际身处的现实情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影调分为光明和昏暗，色调分为暖色和冷色，而以前者为主导；音乐时而雄浑刚健，时而低回悲怆，而以雄健为主导。结尾处，邓小平乘坐的列车穿过隧道，车厢完全黑暗下来（这显然非真实），火柴划燃，照出他沉静坚毅的脸庞，随后列车再次进入光明。这些精当的艺术手法为影片奠定了庄严中带有悲怆、悲怆后走向昂扬的美学基调。

影片在美学上的成功是全方位的。剧情里邓小平的生活空间受限，摄影采用了许多流畅的长镜头，帮助观众的视线延绵运动，营造出特写、中近景、变焦、景深等景别和构图的变化，同时又与人物身体和内心活动的节奏相吻合。有多个场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来自他对身边众人的观察，偏写实化；第二次则出自他的回忆和思考，色彩的消失、画面的动荡、剪辑的激烈，造成强烈的心理蒙太奇效果，把情绪的能量和思考的逻辑直观地呈现出来。

叙事的手法尤其值得称道。除了正面塑造人物，影片还用到传统小说美学的烘云托月手法，即用他人的行动和语言来侧面、多面烘托出邓小平形象。笔者感觉，黄干事的形象，在邓小平和邓朴方之外又加入了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处理得极其微妙。邓小平离开江西前和黄干事的交流，亲切中甚至有几分诙谐，从今天的时代节点来看，这给了红卫兵一代来自长者的一份宽厚、宽容、谅解，而不是一味严苛的批评。

影片的一个场景里，多个人物在行动，多条线索在交织，历史和命运叠加成特定时空上的重量。“黑五类”子女为了立功，可以暗中观察三天来确认邓小平的身份行踪，她找领导汇报时后者正忙着在舞台上饰演《红灯记》李玉和，这使得他和前者说话时还用了京剧念白的腔调。随后，红卫兵闻讯前来揪斗，和护厂工人紧张对峙，邓小平的安危骤然成为核心的悬念。令人想不到的是，红卫兵队伍里突然闪出1931年瑞金县老革命罗志才的儿子，苦苦哀求当年的县委书记邓为老母亲写证明清白的材料。剧情急转直下，同时观众所关心的邓小平的命运也一下子被拉到更大的视野里，成为更多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困境和考验。当邓小平告诉那个年轻人要“忍耐”、“想得开、挺得住”时，他既是在嘱咐当年的战友，又何尝不是在鼓舞自己？他后来对邓朴方说，“忍，不是就认输了，是信仰，信念”。影片的叙事就是这样，用场景交织线索，场景和段落的改换又由线索牵连起来。

接下来，罗朋有了足够的理由来凿开隔墙，为邓小平夫妇铺就那条著名的“邓小平小道”。这里又有很多观众可能注意不到的一个细节：在邓、卓初次走上这条小路时，工人师傅们已经在路面上铺好了防滑的煤渣，这在镜头切为远景的山坡、草木时从色彩上相当鲜明，又并不抢眼。也是在这个画面上，才出现了片名，影片叙述时间已经过去了约25分钟。显然，电影的艺术修辞，是创作者非常重视、同时也非常擅长的工作，它保证了影片的艺术质量，进而确保了主题意念潜移默化的传达。

上述电影语言的运用，都显现出高度自觉的、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电影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引用现实主义杰出作家柳青的话，“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由此推论，不妨说，《邓小平小道》为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找到了一些新的拍法。它也体现着习总书记所说的，“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之久远。”总书记还曾引清代叶燮《原诗》中的句子阐明艺术工作者应当有怎样的情志：“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对于重大历史和人物题材的创作来说，要塑造好伟人，创作者就不得不努力去真正接近伟人的精神世界。这也是《邓小平小道》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在一众创作者中，主演卢奇令人印象深刻。作为特型演员，他在本片里贡献了堪称个人职业生涯中最好的一次表演。

影片里，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邓朴方说，“要记住这条小路啊，它是工人和老百姓为我们修的。”正是因为记得人民，邓小平再次出山后为人民设计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开始带领人民走出贫穷奔小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重要一步。“邓小平小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的辩证关系，实际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人民创造历史。《邓小平小道》的出现，正是这一命题在电影领域内的一次尝试，即以创新化的主旋律电影语言完成的创新型历史叙事。